

三明作家书架

名作新读



《三国演义》里的羊

●邱俊霖

羊是软弱或弱势的象征,韩馥想让袁绍同治州事抵抗公孙瓒,长史耿武便说这是引虎入羊群。北海太守孔融被黄巾余党围住,刘备和太史慈前往救援,太史慈与关羽、张飞赶走贼众,刘备也觉得如虎入羊群,纵横莫当。

古人认为羊寓意着吉祥,所以在古代流行一种羊酒,常被用于婚聘、贺岁、赐赏等活动。曹操官渡之战大破袁绍,刘备想乘机偷袭许昌,结果被曹操回过神来击败,狼狈逃到汉江,土人以羊酒奉上。这种羊酒,是以羊肉入料,窖藏发酵酿制而成。

在三国里,羊还有顺从的意思。一般守将开城投降,都得准备两样东西:一样是酒,还有一样就是羊。羊既寓意着自己的服从,也有犒劳对方的意思。比如孔明劝说周瑜抵抗曹操,便用了激将法,说“愚有一计,并不劳羊担酒,纳土献印”,只需要将大乔小乔送到曹营,百万雄兵也就自然退了。后来刘备取西川,涪关守将杨怀、高沛二人假醉,也得牵羊送酒。

当然了,羊还有喜庆的象征,但凡隆重场合或者重大活动,都少不了吃羊肉。比如关公过五关斩六将,途经郭某的庄院,郭庄主便宰羊置酒相待。刘备到东吴去结亲,先到南徐拜访乔国老,不忘牵羊担酒,后来要见吴国太,也得先采购猪羊果品。

要说《三国演义》里最能吃羊肉的人是谁,那大概是左慈。话说左慈见了曹操之后,索要酒肉。先是饮酒五斗不醉,后来又肉食全羊不饱。被曹操监禁七日,不给饮食,却也毫发无损。曹操好奇,左慈却说:“我数十年不食,亦不妨;日食千羊,亦能尽。”

左慈掷杯戏耍曹操,化成一只白鸠,绕殿而飞。曹操让许褚带着三百铁甲军去追赶擒拿。赶到山中,见有牧羊小童赶着一群羊而来,左慈便走入羊群内。许褚气急败坏之下将羊群杀尽了。牧羊小童便守着一群死羊大哭,左慈用魔法将羊全部复活了。如此看来,在三国的世界里,羊是一种被广泛饲养的家畜。

要问《三国演义》里第二能吃羊肉的人,这很难找。不过甘宁应该是热门候选人之一。话说甘宁准备带着百骑劫魏营,孙权赐给将士们五十瓶酒和五十斤羊肉,甘宁与百人共饮食尽。也就是说,一百零一个人分了五十斤羊肉,一个人还不到五两,看完只能感慨一句:孙权真是个人。

要论吃法讲究一点的,便是以羊肉为馅做成包子。诸葛亮七擒孟获,班师回朝,途经泸水时,便和面为剂,里头用牛羊等肉为馅,塑成人头,人称“馒头”,用以祭祀泸水。这实际上更类似于后来的包子。

羊肉无疑是《三国演义》里最受欢迎的一种荤菜,至于里面提到的羊肉吃法,也许是汉朝或三国时代的,也可能是罗贯中所生活的明朝初年。无论如何,人们对于羊肉的喜欢,从古至今就没变过的。

《三明往事》的地方文化叙事

●柳传堆

小说要写人物、写事件,而人又是社会中的人、文化中的人。中外文学实践证明,有丰厚文化内涵的小说才有厚度、广度、深度,如四大名著的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。特别是《红楼梦》,文本涉及的文化内容,广厦万间,堪称文化的“百科全书”。因此,小说家不得不关注人物活动的文化氛围与文化环境。同样写文化,不同的小说家,水平、眼界有高低、优劣之别。

绿笙在长篇小说《三明往事》里写了三明区域的城墙文化、理学文化、宗祠文化、宗教文化、民俗文化、神秘文化、革命文化、现代工业文化等。

一、三明历史文化的溯源流长。三明从1958年建设钢铁厂起,直到现在,还被习惯称为“新型工业城市”“移民城市”,大家误以为三明原先不具有深厚的本土文化,甚至有人说在建设工业城市之前“没文化”,蛮荒之地云云。这其实是工业文明、现代城市“神话”所带来的负面效应,让三明本土居民及其外来移民误解了60多年。《三明往事》以文学的形象画面为三明的“没文化论”平反,告诉读者,三明的行政隶属、行政区划大小变化很大,但三明是有历史的,有丰厚的文化传统。三明不仅有文化,且溯源流长。

三明有很多老房子、老宗祠。有很多像罗氏大厝、黄氏宗祠、林氏大厝那样的老房子,深宅大院。成片的大宗祠表明这里居住着好多望族,有家训族谱,有根有源;培育出来的人,有规矩,有格局,有风范。在时代风云变幻之际,识大体,明大义,敢于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。

三明有明清留下的老城墙、老城门、老街坊。三元、列西(梅列)均有,列西有梅列门、康乐门、紫凝门等,三元镇有“前街、后路、九巷、三坊、八堡”,三元城关富兴堡、龙船巷的名字,迄今尚存,其余景观与名字已随历史烟消云散。小说描写得很详细。

三明有老寺庙、大寺庙。列西的梅列门上有观音阁、太保庙。太保公是流传于沙溪河流域直至下游闽江流域的本地神祇。据沙县南阳太保庙、沧州太保庙的遗物推测,太保信仰及其立庙奉祀大约起源于北宋。此外,最突出的老寺庙、大寺庙是正顺庙。三元地下党邓凡平等与邢如彬接洽工作过程中,带出本地赫赫有名的正顺庙,介绍了谢佑爱国佑民的传奇人生。小说的主人翁之一邢如彬,当年红军侦察班长,他不仅对列西本地神祇谢佑、本地文化感兴趣,且善于研究民俗民情,在做基层革命工作时,巧妙动员船工耐桃为红军强渡沙溪河的木船舵手,排头尖兵;动员当地百姓为红军修船作战,有船的献船,没船的献木板造船。巧妙地将本地信仰中的为民除害、舍生忘死的“义”字,与我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,为百姓解放不惜牺牲一切的“信念”结合在一起,形成邓凡平、罗梓安、耐桃等人的文化底蕴。

三明有福建理学的精华——四贤祠、楚三公祠。在这一片区域内,儒家思想,尤其是理学,滋养哺育沙溪河流域民众的传统主流文化,这种文化弥漫开来,渗透在列西正顺庙、楚三公祠、罗氏大厝、忠山十八寨古厝、四贤祠的建筑格局、艺术装饰、特色楹联撰写……之中。

贯穿小说始终的主人翁罗梓安是土生土长的列西本地人,另一位为革命献身的地下党员邓凡平是三元镇本地人。以这两个人的活动轨迹为线索,带出了三明市区(古时不是市,是小镇)及其周边沙县、列西、莘口、贡川、岩前、忠山十八寨、白水村、南坑村、筠竹村等。在南(南平)沙(沙县)永(永安)公路开通之前,沙溪河是连接福州、延平、沙县、三元、永安的重要水道。总之,历史上的三元、列西(梅列)是沙县的辖境,因此,三明的根脉是千年古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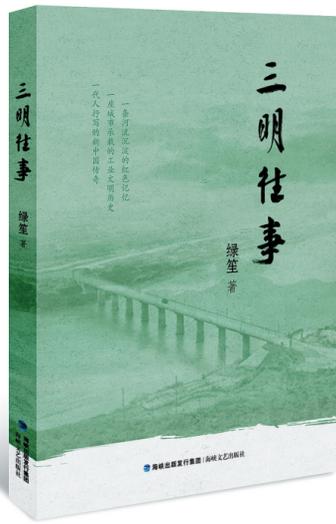
二、三明本土文化的混溶性特征。混溶性是边远山区文化的主要特性之一,其特征是文化精华与文化糟粕并存,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共生,雅文化与俗文化互为交融。

三明这块土地有主流文化,如儒家文化;有道家文化、佛教文化。有雅文化,也有俗文化。《三明往事》所写的三明文化主要包括人们的多元信仰文化、儒家文化(楚三公祠、四贤祠)、道家文化(谢佑)、精英文化中的雅文化(如古建筑文化)、民俗文化(如抓周、龙船歌)等。

现实中,三明地域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庙宇众多,供奉的偶像多,信众多。《三明往事》写到的有佛教,如梅列门上有观音阁,阁上有对联曰:“做事奸邪对我烧香何益,为人正直对我拜无妨”,劝人弃恶从善。有道教,如正顺庙。梅列门观音阁同时供奉有“太保公”,也属道教系统。绿笙的小说叙事,关注地方庙宇,将庙宇的文化内涵融入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塑造中,颇具智慧。

宗教信仰、民俗活动,其中有的是精英文化、雅文化,有的则是俗文化。《三明往事》写到的“四贤祠”“楚三公祠”等属于精英文化、雅文化部分。古建筑文化描写在《三明往事》中占不少篇幅。小说主要以工匠先生罗梓安的视角,随着他的木匠营生、地下党活动,参与三明城市建设等轨迹,作者巧妙地将罗氏大厝、楚三公祠等美轮美奂的木雕艺术展现出来。

罗梓安的看法本最核心的是聪颖、悟性高,善于思考,有艺术创造的天赋,只要看到雕刻艺术样品(哪怕是残件)或高人指导点拨,立马心领神会。沙县一位长得“精精瘦瘦”文化人指点他,“只有有文化和文化情怀的手艺人,才能制作出时光里不朽的作品。”于是,他开始揣摩有想法与有文化不同,有文化与有文化情怀之别。从此,他一通百通,木匠技艺出神入化,制作的雕件无不栩栩如生,件件是精品,最终成了民间交往、官场应酬的社交珍贵礼品。因此,从罗梓安木匠



大师的成长过程中可以看到,在三明这块土地,既有曾经技艺高超的顶级师傅,更有审美眼光一流,能够点拨他如何提高审美境界的高人!

抓周、龙船调、地方小吃美食等俗文化描写,在《三明往事》中也有不俗的表现。抓周习俗很多地方都有。从理性视角看,抓周预测孩子将来的职业选择富贵与否的“神话”,是典型的唯心主义习俗。如果从民俗视角看,抓周则不啻为一种民俗娱乐活动,无非是让孩子周岁“仪式感”更为丰富有趣而已。其他如周岁服装、头饰、服装、宴请等均属于“仪式”规程,也属于成人“游戏”,它可以给人间枯燥、苦闷的生活增添趣味,这方面小说没有写到。

沙溪河一年一度的端午节龙舟赛,小说浅尝辄止,着墨不多,但作者对《龙船歌》颇感兴趣。红军强渡沙溪河中,罗梓安冒着枪林弹雨参与渡河作战,以男性特有的刚毅,大声吼唱《龙船歌》,颇有“壮饥餐胡虏肉,笑谈渴饮匈奴血”的豪迈。

《龙船歌》,在三明也叫《龙船调》,是本地人每年端午节划龙舟比赛而咏唱的民歌。它与其他地方的山歌差不多,七个字,四句。绿笙将《龙船歌》用于祭祀强渡沙溪河作战英勇牺牲的红军战士,又把《榨笋歌》用于三明建设的火热场景中。后一首民歌是罗宇清唱给恋人邢明听的。这对恋人,响应党的号召,积极参与热火朝天的三钢早期建设。为了搭工棚,解决职工住宿困难,一同上山砍竹子,道路崎岖,披荆斩棘,万分辛苦,为了解乏,唱起《榨笋歌》。其歌词粗看是榨笋,其实里面暗含着粗鄙的两性关系,典型的民歌比兴手法。罗宇清还曾经给恋人唱过一首民歌《初恋》,色彩更纯正,语言明白晓畅,通俗易懂,非常适合山野青年男女传唱。

特色小吃,也是构成俗文化的一部分。达官贵人、市井小民都离不开吃喝。小说顺手写到了三元龙船巷豆腐街上的豆腐店、糕饼店、番酒店等,其中豆腐店的豆腐最有特色,而猪血饭又是三元人民的一大独创。罗梓安去沙县时,与时任沙县第四小学校长的罗有才在饭店里吃豆腐丸、扁肉,品小酒,由此带出沙县小吃的描

写。餐饮文化是地方文化最直观的特征,其背后的文化内涵深厚,小说中没有更多展开。

三、外来工业文明、现代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强势植入。20世纪80年代,三明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,成为全国精神文明的样板。那么,三明凭什么夺得这项荣誉?《三明往事》有了形象的回答。1958年之前三明的工业基础几乎是空白的,除了今天三明市建设局位置有一个电厂外,几乎看不到什么机械。中央将三明作为小三线建设基地的决策出台后,冶金工业部选定在三明列西建设大型钢铁厂,三明迎来工业文明大发展的良机。十万建设大军业余需要娱乐,于是红旗影剧院建设起来了,要知道,那个时候福建省除福州、厦门外,其他地方几乎看不见影剧院。大型国有企业多了,人多了,三明专区(省政府行署)成立了,于是《三明报》(后更名为《三明日报》)办起来。工业文明是一种与农业文明迥然不同的文明,它的到来,带给三明人民的不仅仅是物质条件的变化,更重要的是带来生活方式、思想观念的变化。人们从小村镇的熟人社会进入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组成的陌生人社会,一切(含心灵律动、思维方式、社交方式等)都在改变。遗憾的是,作者在这方面着墨不多。

综上,笔者以为,《三明往事》的地方文化叙事不足有二:一是对三明文化的多元性、包容性、混溶性表现不足。比如小说也写到三明的多神教信仰,但对沙溪河流域宗教信仰的丰富性、复杂性表现不够。二是对三明的“雅文化”“精英文化”表现不足,显然受狭义的“三明”概念的影响。在写到沙县小吃的“俗文化”时,对其“俗”中有“雅”的成分关注不足。三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内涵,工业化时代市民行为方式、话语方式,伦理道德观念的微妙变化,体验不深,重视不够。总体看,小说红色“革命”部分写得比“建设”部分好。这些不足之处,有待作者在后面的创作中思考解决。

(柳传堆:福建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、三明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三明学院教授)

我与书

我的小人书情结

●郑承光



小人书,即连环画,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读物,其画面朴素简洁,附注文字直白、易懂,有些不常见的生僻字词还用汉语拼音括注,读起来很方便。尽管年少时,我时常读错一些字词,对字义也不甚了解,但通过边拼读,边看图猜测,也能领会其中大概的意思。在文化和娱乐生活比较缺乏的20世纪70年代,小人书给我带来了许多欢乐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,这类童年读物已渐渐远离了人们的生活,但它仍能唤醒我对童年的美好回忆。朴素简洁的图景,生动曲折的情节,栩栩如生的物

时不时的在我记忆的橱窗里闪现,如过电影一般。记得我读小学二年级时,由于家里兄妹多,家庭生活极其困难,父母每月只能从微薄的工资里挤出一两毛给我作零花钱。我舍不得用它买零食,而是步行到十里外小镇上的新华书店,买回自己心爱的小人书《高玉宝》《刘胡兰》《渡江侦察记》《铁道游击队》等。如此日积月累,到了五年级,我的小人书有整整一大箱,每天一有空就拿出来翻看,其乐无穷。遗憾的是,20世纪80年代我家盖新房,这些小人书在搬家时丢失了。

此后,每当我想起伴随我度过童年

美好时光的小人书,总有一种怅然若失、惋惜、唏嘘不已。但小人书带给我的精神滋养,给我打下的语言基础,却让我终身受益。我上初中时就养成了每天阅读的好习惯,阅读范围涉及文学、历史、地理、自然等各门学科,不论是家里,还是在公共汽车上,一有闲暇便如饥似渴地读,甚至每次出门远行都要到车站候车厅,或当地报刊亭买上一两本书刊阅读。记得有一次我乘硬座火车从南平到江苏无锡,是书刊伴我度过旅途中孤独的十多个小时,直到终点站都浑然不知,还好乘务员提醒我下车。